



大 / 家 / 译 / 丛
TRANSLATIONS

新西方论[○]

For a New West

Karl Polanyi

[匈牙利] 卡尔·波兰尼 / 著

潘一禾, 刘岩 / 译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大 / 家 / 译 / 丛
TRANSLATIONS

新西方论[○]

For a New West

Karl Polanyi

[匈牙利] 卡尔·波兰尼 / 著

潘一禾, 刘岩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西方论 / (匈)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著;
潘一禾, 刘岩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7.1
(大家译丛)
ISBN 978-7-5507-1679-7

I. ①新… II. ①卡… ②潘… ③刘… III. ①经济发
展—研究—西方国家②社会发展—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F113.4②D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7485号

新西方论

XIN XIFANG LUN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万妮霞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02(批发) 83460293(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755-83461000)
印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05千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
定价 4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收集在这个论文集中的文章都源自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取自那里的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手稿档案。这些原始手稿有许多是难以辨认的，因为上面或者布满了作者手写的评论和修正，或者纸张已经有些残破。我们努力让自己的编辑工作完全忠实于原始呈现的文本和作者本人的意思，如果有较大疑问之处也都写入了注释。为了便于阅读，我们修正了一些打字和语法上的失误。按通常做法，我们用黑体来标明作者原来强调的部分。每篇文章在波兰尼档案的具体出处和写作时间，我们已尽力标注在每一篇文章中。

编者想向卡尔·波兰尼·莱维特（Karl Polanyi Levitt）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感谢她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并许可我们出版她父亲的作品。我们也要真诚感谢玛格丽特·门德尔和安娜·戈麦斯（Marguerite

Mendell and Ana Gomez), 她们热心地帮助我们, 获得波兰尼档案中的第一手资料, 并协助我们对手稿进行整理和翻译。我们还要衷心感谢米歇尔·甘贾尼和大卫·拉曼蒂 (Michele Cangiani and David Lametti), 他们为本书的编辑提供了富有思想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要感谢曼努埃拉·特库珊 (Manuela Tecusan), 在她的宝贵意见和帮助下, 我们才完成了这本书的英文版。通常免责声明在此适用。

注:

此为意大利文版编者的话。

意大利文版序

卡尔·波兰尼·莱维特

近年来，对卡尔·波兰尼著作的研究兴趣明显回升，《大转型》已经被译成十五种语言，包括中文、韩文和阿拉伯语。关于波兰尼的知识遗产已经出版了不少专刊或专辑，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独到分析，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论坛中被引用，包括 2012 年最近的这次“达沃斯论坛”。据报道，卡尔·波兰尼的灵魂游荡在这个全球精英出席的会议上。仍未解决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在社会中地位”之根本问题的深思——这是我父亲所有作品的中心议题。要想真正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我们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或者说最重大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历史。为了这个目的，乔治·雷斯塔（Giorgio Resta）和玛丽娅维多利亚·卡坦扎瑞蒂（Mariavittoria Catanzariti）为我们整理出了一批卡尔·波兰尼生前尚未发表的演讲的意大利文翻译版本，包括他从 1920 年早期到 1964 年去世这个时期的一批手稿。这个吸引人的论文集让我们重回两次世界大

战年代，重新审视那时欧洲自由经济秩序的崩溃和民主制的让位。今天民主制度遭遇的新风险，无论是因为资本无法有效监管和控制的危险，还是由于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都建议我们要认真地重读这样一本书。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本论文集，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波兰尼的生活和他的社会哲学，以及我本人对《大转型》一书的最新反思。

我的父亲是一个满腔热情的人。他坚定地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担当社会责任。在他早期的文章和在匈牙利的演讲中，他都认为自己和他那一代人（他称“我们这一代”），对于 1914 年出现的灾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蹂躏负有一种道德责任。对他来说，自由与责任是分不开的。我相信他对市场化社会的批判是出于对日常生活商业化的厌恶，更概括地讲，是出于对社会关系非人格化的反感。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必须确保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社区、社会和民主政体的责任。由于这些原因，他不信任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同样不信任内含其中的政治中央集权。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维也纳，在德语区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杂志上，他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展开了公开争论。波兰尼为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个“功能主义社团”的概念，个人作为劳动者、消费者和公民，他们的利益可以通过组织和代表之间的谈判模式来协商和调解。这与科尔（G.D.H.Cole）倡导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所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Austro-Marxism）有明显相似之处。

在那个年代，我父亲一直通过当记者来让自己拥有他认可的心安理得的生活。我不想涉及过多的家庭逸事，但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对她的每一个孩子的职业选择确实都有明确意向的。她认为我的父亲应该成为一名律师，我的叔叔迈克尔应该成为一名医生，而大哥阿道夫是要跟随他的父亲做一名工程师和企业家。然而，阿道夫根本不听从指令，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比当时的任何人都离家出走得更远——他一直去了日本。后来他移居意大利，在那里他因触犯墨索里尼的法律而再次移民巴西的圣保罗。他在圣保罗生活了很多年后客死他乡。接着是我的父亲。他虽然签约了叔叔家事业兴旺的律师事务所，但却决定从指定所属的资产阶级世界出走，成为一个被其他家庭成员描述为“辍学生”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记者和政治分析家。我已阅读了他写给德国《明镜周刊》的全部文章，《明镜周刊》是当时欧洲领先的德语金融和经济周刊，仿照的是伦敦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明镜周刊》之《奥地利经济学家》国际事务版的资深编辑。随着1933年希特勒的入阁，法西斯主义的影子蹑手蹑脚进入了奥地利。杂志主编和出版商都遗憾地表示，已无法让波兰尼这么一个知名社会主义学者再当编委。他们建议我父亲前往英国另找一份工作。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他在英国找到了一份“工人教育协会”的讲师工作，该协会是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合办的成人教育高校。他被要求讲课的内容是当代国际关系，这对他当然是太熟悉了，另一门课为英国社会和经济史，这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课题。他在肯

特郡和苏塞克斯省城公共图书馆承担了夜校的课程，这两门课的讲稿后来就成了《大转型》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时期，他还上了一门题为“现代社会中的冲突哲学”的课程，本书的这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对外发表。

就像马克思一样，我父亲认为英格兰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源头——尤其是在 1815 年到 1845 年这 30 年中，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中的立法和基础性设施已经建立起来。当然，金钱的自由市场已经过时，可以追溯到禁止高利贷等法律的废除这件事，从基督教教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罪恶的。总之，劳动力、土地和金钱市场具有将经济从市场中剥离的功能。经济承担了它自己的生活，社会被改造去服务经济的需要。这样的状态是史无前例的，很奇特，然而，却为经济发展释放了无限的能量。

我父亲的思想脉络，我认为可从卡尔·马克思延伸到马克斯·韦伯、斐迪南·滕尼斯，还有两名研习古代经济（现在称“经济人类学”）的学生：德国的图恩瓦尔德（Thurnwald）和维也纳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我提醒这点与当代关于社会权利和经济危机关系的辩论有关，因为人类历史上（记录或未记录）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所有的个人或独立家庭被允许全都陷入赤贫或由于饥饿而死，除非整个社会跌入了困难时期。在原始社会，没有收成确实可能带来粮食的严重短缺，但是当其他成员都被提供食物时，不可能存在一个家庭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最近的历史发展中，即 19 世纪早期以来，恐惧饥饿、热衷致富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动机。仅仅因为这些原因，先不考虑以后的发展，

我可以说，单单作为一种公民权利的社会产品共享，就已经赢得了卡尔·波兰尼的全力支持，无论是作为去商品化地获得经济谋生的手段，还是作为道德正义的理由。

考虑到社会权利和全球公共产品的当代争议，我认为有三个不同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父亲会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概念：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社会、第三（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政治原因。我父亲的经济观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曾被多次重申。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就可以明白，有需要的人会把自己的基本收入花在消费品上，从而为生产商创造市场机会。此外，不断加速的技术创新必然会让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投入到工业活动中去，从采矿业到制造业、从交通到商业，都一样。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将雇佣工资收入视为获得应得社会产品的唯一权利——甚至是主要权利——不再合理。鉴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本质越来越不确定，基本收入的设定，就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开展经济活动的平台，这使得人们在辛苦谋生的年代获得了一些慰藉。

社会争议就是公正的一部分。哪个社会出现不公正，哪个社会就不会有凝聚力。在社会不公且缺乏凝聚力的条件下，国家在所谓充满争议的社会产品分配的谈判中将是无效的。这样的社会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肯定是缺乏效能的。人们现在认识到一个更平等、更少触目惊心的不公正现象的社会，就能更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相信最有效的经济发展动力，最终取决于社会凝聚力的程度和社会正义观念的拥有，只有充满

希望和信念的人民所释放的能量，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才会最终引导人们公正和公平地分享社会化的产品。

我父亲支持全体人类要保证有最低收入的第三个政治性的原因，涉及技术极大进步后他对社会中人的自由问题的关注，也是他在《大转型》最后一章所写的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纽约市和加拿大之间频繁走动，他变得越来越多地关心社会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警惕“一致性”或他所说的“平均主义”（*averagism*）是他在当时的潮流中不太愿意表达得太多的异议。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他发现一个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已经播下了它的极权主义种子。我要提醒的是，他写下这些想法的时候，媒体的作用还远没有现在这样明显，媒体对社会的总控制权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变得如此超级强大，当然这也是在我们目睹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之前。“9·11”之后，发表与美国官方观点不同政见的成本已经变得如此之高，几乎令所有人望而却步。

我父亲认为，对自由的保护，会对非一致性有一种制度化的要求。他认为这是一种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美德。但那些古典自由主义只提供特权上层阶级，让他们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作为食利者从自由中获益。顺便说一下，当年这些上层人士的很多收入来自英国和法国众多的殖民地和海外投资。这是英国、法国、维也纳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西欧更是如此。虽然这种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美德产生过伟大的文化成就，但这类自由被限制在有限的人口之中。我的父亲很熟悉古典希腊文学，特别推崇

亚里士多德。他相信亚氏的观点，即发现经济是社会生活中的独特领域。但是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劳工奴隶基础上的。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我父亲的家庭是一个受益者，资产者的文化表达会有效地限制在一个特权阶层。

波兰尼认为，创意是人类的基本属性和需要，作为一种可以行使的能力，应在整个人类群体中被允许和保护。在他看来，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体现的是集体的智慧、知识、传统和普通人的常识。这与所谓的流行文化（pop culture）无关；而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民主国家，民主根植于独特的大众文化和集体意识。这个观点发展为一篇题为《让-雅克·卢梭：自由是可能吗？》的文章，写于1953年，若干年前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1]这篇精彩的文章探讨了启蒙时代之自由与平等关系这一经典问题。我父亲发现他的论点得到了卢梭思想的支持，即最终，政府必须依靠大众文化和集体意识中的智慧、知识、传统及常识来运作一切。在他去世前几天，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封建国家的关键是特权；资产阶级国家的关键是财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是人民，是享受文化共同体（a community of culture）的集体存在。我自己还从来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

如前所说，我想对《大转型》与我们的时代的关联提供几点自己的看法。应当理解的是，在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中提到的大转型，是指从19世纪的自由主义秩序（在1914年倒塌了）到各国为了保障经济民生而采取措施的转型，或者通过国家法西斯主义、苏联国家计划经济，或者通过美国式“新政”。

在欧洲大陆，工业界与由拥护社会主义多数统治的议会之间的冲突之激烈，曾使得原有的民主政治进程几乎瘫痪。但在写于1932年题为《经济与民主》^[2]的文章中，我父亲注意到了以工业资本家为代表的经济利益与以议会多数为代表的民主之间的冲突。凡是在工业界利益占了主导、议会多数代表的社会主义观点处于下风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总是民主的悬置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反之，凡是当冲突朝着有利于用政治民主，同时也是用经济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时，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南美洲出现的搁置民主、转向军事独裁，其证明自己的理由也是保证国家的经济稳定。而20多年后南美洲出现的回归民主制，也是因为在多年面对大众的政治动员中，领导人强调的是要抵制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

众所周知，《大转型》最后的两章写得十分匆忙，甚至留给同事去从笔记中进行编辑。在1943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急不可耐地从美国前往英格兰，那时他已经知道纳粹肯定已经在斯大林格勒被打败，那是世界大战的转折之战。他希望参加关于战后世界如何重建的讨论。他的乐观预见反映在倒数第二章中。他写道：劳动力、土地和金钱将不再是商品，国家将可以自由地采取适当的国内经济体制。对生活必需品和主食的价格，国家可以用固定的方式来防范市场的不确定影响。在1945年题为《通用资本主义或区域经济规划》的文章中，^[3]他表示目前只有美国人相信普遍的资本主义，而19世纪放任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预言并未全都成真，虽然战后出现了福利国家，

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推进作用增强了，在实现充分就业和调和劳资矛盾方面也多有成就。

自 1944 年出版以来，《大转型》一直拥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但直到 20 世纪末，对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批判才真正出现，因为“转型”为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严重破坏了维持地球上生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波兰尼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关注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冲突，现在已经具有了全新和全球层面的视野。在过去的 30 年中，资本已经成功地回流到许多北美福利国家——现在也到了欧洲——交税的负担已经从富人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美国和加拿大，由于最近 30 年内国民的实际平均工资或薪水几乎没有增加，所以虽然生产率一直在提高，实际只有高收入者在增收利益，多数人已越来越贫穷。由于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和调控地全球自由流动，用数字表示的金融财富的聚集，就不再有什么意义。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即使最强大的政府现在都受到金融资本的支配。

1933 年我父亲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世界经济危机的机制主义》。^[4]他认为，最终世界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应该不是证券交易所的狂躁症，或类似华尔街在 1929 年出现的崩盘，或甚至是 1931 年出现的英镑兑换黄金的终止，而是由于英国、法国和美国在看到各类帝王、国王、沙皇和苏丹们纷纷在政治地震中轰然倒下后，会想方设法恢复 1914 年前的自由经济秩序。世界大战有一种不可调节的人性和社会代价，即作为西方战胜国和债权人，一方面想要德国付出惩罚性的赔偿金，另一方面也因国力贫弱而想

改变制度。

这就要求我们从全球化视角和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去重新审视 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中心地带，经济滞胀和衰退造成的国内投资回报率低迷，引发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回潮。与之同步的是东亚经济因为实施工业化政策而引发的高增长。世界经济增长点从北部和西部向南部和东部的转移，这一现象首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显露，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全球权力关系改变的事实。尽管欧盟和美国仍是最大的市场，但南半球的生产能力明显超过北半球的消费能力。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曾经作为世界经济主要特点的局面，即各国经济都依赖于欧洲和北美的出口市场，这一传统已经难以为继。

正是那些更深卷入到各资本主义不同中心的金融结构和贸易关系中的国家，被近期的金融危机打击得更为严重——尤其是欧洲的东部、地中海地区国家和美国的南部地区。这场金融危机还远没有得到解决：统一的欧元是否更好？这仍是一个疑问。在收入不平等、政治制度不强调平等的前提下，美国要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经济通货膨胀的能力，如应对负债累累的家庭和企业，要超越 20 世纪 20 年代的历史最高水平，也困难重重。与此相反，新兴经济体则在成功地抵制过度自由化，保持国家对银行和外部资本账户的控制，并积极引导外部资金投资国内经济，所以它们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能迅速恢复元气，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

注释:

- [1] 可用意大利语翻译为:《让-雅克·卢梭,或你可能自由的社会?》见卡尔·波兰尼《复杂社会的自由》(都灵:博拉蒂出版社,1987),161—169页。
- [2] 《经济与民主》,载《大转型:1920-1945》,[马尔堡:大都会出版社,2002(1932)],149—154页。
- [3] 最初发表在伦敦的《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季刊,10(3)86—91页。
- [4] 《大萧条的机制》,载《奥地利经济学家》25(增刊),2—9页。

目 录

意大利文版导论 / 乔治·雷斯塔	/ 001
第一部分 经济、技术与自由问题	/ 033
第1篇 对于一个新西方	/ 034
第2篇 经济学与塑造我们社会命运的自由	/ 039
第3篇 经济史与自由问题	/ 046
第4篇 经济思想新境界	/ 055
第二部分 制度问题	/ 063
第5篇 制度化分析对社会科学的贡献	/ 064
第6篇 国际性理解的本质	/ 078
第7篇 和平的意义	/ 090
第8篇 和平主义的根源	/ 099
第9篇 未来民主英格兰的文化	/ 107
第10篇 维也纳和美国的经验：美国	/ 118